

【北京大学历史与社会研究丛书】

北京大学文化传承与发展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历史与社会政策研究中心 联合主办

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

近代中国： 地域秩序与社会变迁

主编 王元周 徐鹏

Modern
China:
Regional Order
and Social
Vicissitudes

 江苏人民出版社

Ⅰ 北京大学历史与社会研究丛书 Ⅰ

北京大学文化传承与发展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历史与社会政策研究中心 联合主办

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

主编 王元周 徐鹏

近代中国： 地域秩序与社会变迁

Modern

China:

Regional Order

and Social

Vicissitude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代中国:地域秩序与社会变迁/王元周,徐鹏主
编.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 7
(北京大学历史与社会研究丛书)
ISBN 978-7-214-21119-4

I. ①近… II. ①王… ②徐… III. ①中国历史—近
代史—研究 IV. ①K25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87539 号

书 名 近代中国:地域秩序与社会变迁

主 编	王元周 徐 鹏
责 任 编 辑	于 辉
装 帧 设 计	姜 嵩
出 版 发 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pph.com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52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 张	28.75 插页 1
字 数	380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7 月第 1 版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214-21119-4
定 价	78.00 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前 言

王元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每一个新研究领域的扩展、每一种新研究方法的引入,都带来史学视角的转换和观念上的进步与更新。上个世纪初期,梁启超曾大力提倡“新史学”,史学的关注点逐渐下移,1980年代以来,历史学的研究取得新的发展,其中尤以社会史的兴起最为引人注目,而经济史研究也在发展。因此,历史流变中的社会与社会变迁中的历史,分别从历时性向度与共时性向度对历史与社会进行综合分析,这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有鉴于此,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部分中青年教师关怀下,由部分中国近现代史硕博士组织,邀请国内外青年学者参加,于2015年10月3日至10月4日举办了第一届“历史与社会”研究生工作坊,旨在为国内外历史学及相关专业的同学提供一个展示科研成果、交流学术经验的平台。会议主题为“近代中国:地域秩序与社会变迁”,希望结合历史学与社会学,贯通政治史与社会史,通过跨学科、跨专业交流,开拓视野,为探究近代中国社会提供一个新的学术切入点。

此次会议共收到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开大学、首尔大学、澳门大学等十余所高校、科研机构的六十余篇论文,经过两轮筛选,共评选出26篇优秀论文,并邀请其作者来京参会。会议结束后,经过整理,我们共收录了21篇优秀论文,

并分四个专题向读者呈现：

专题一为“产业、利益与发展”，共收录 6 篇论文。首尔大学亚洲史系博士研究生金庆的《经济利益与地域秩序的抉择——近代中国开矿之议及其影响》一文，从经济利益与地域秩序、中国与外国、军政界与名流界、清朝满汉官员与驻清外国官员及清朝外籍官员等多个视角论析了开矿之议，并希望通过于此，衔接关于煤矿的既有研究之中的前近代与近代之间的断层。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蔡佳宏的《清末吉省蜂蜜山矿案研究》一文，以清末吉省蜂蜜山煤矿案为中心，在充分还原该矿案前因后果之基础上，对清末东北矿政及其政治经济情势进行了简要讨论。北京市十一学校赵通（北京大学历史学硕士）所提交的《浅析“永久黄”集团融资》一文，以民国时期民族化学工业旗帜“永久黄”集团为研究核心，通过梳理集团发展和融资过程，分析不同时期中国资本市场环境以及企业融资战略和特点的变化，论证资本市场的成熟导致了近代中国工业化进程始终被局限在开端阶段。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硕士研究生孔迎川的《晚清济宁的社会结构与新经济构建——基于与鲁西北商业中心临清的比较》一文，以济宁和临清为代表的运河商业城市为研究中心，认为晚清黄河改道造成的山东黄运地区环境变化，对山东运河沿线城市经济产生了重大打击，而在这一过程中，社会结构的差异对作为鲁西南商业中心的济宁与作为鲁西北商业中心的临清的近代经济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洪瑛媛的《试论 20 世纪 30 年代前期北京的旅游事业》一文，以 20 世纪 30 年代前期北京的旅游事业为研究对象，梳理出这一时期北平市政府发展旅游事业的轨迹，并初步探讨了 20 世纪 30 年代前期北平市政府的游览社组织与国际宣传。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硕士研究生田梦雪的《一项传统手工艺的近代“遭遇”——博山琉璃的兴衰史》一文，梳理了明代到近代博山地区琉璃行业的发展史，一方面探讨了国家制度的影响，尤其是在明代，特殊的国家户籍政策使家族生产技艺得以传承，另一方面，作者也发现，随着国家管控程度的降低，其他方面的因素开始发挥更大的作用，如市场因素。

专题二为“教育、宗教与慈善”，共收录 5 篇论文。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张亮的《制度与观念之间——孟禄与一战后中国的教育改革》一文，以孟禄访华与一战后中国的教育改革为研究对象，从孟禄来华所观察到的新制度与旧观念之间的张力，结合当时中国教育改革所面临的实际问题，探究新教育逐步实践后“制度虽变，观念不变”的困境。北京市人民政府研究室傅程豪（北京大学历史学硕士）的《绍兴县的社会教育与地方社会发展（1912—1947）》一文，详细梳理了近代绍兴县教育事业的发展以及对社会的影响，并探讨了近代政党“运动学生”的过程中学生群体谋求“再中心化”的努力。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努丽亚·卡迪尔的《清至民国时期新疆维吾尔社会中阿訇司法地位的变迁》一文，探讨了阿訇作为宗教法庭中“仲裁人”的身份所发生的变迁，认为这一变迁过程是国家司法机关对维吾尔社会民事司法领域影响力的加强，是近代国家司法体系对边疆司法领域的逐渐渗透，也是中央政权对新疆的法律管辖与行政管理的强化。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刘茂伟的《公共卫生视野下的近代中国麻风病救治研究——以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广东省为中心》一文，以近代广东省地区麻风病救治事业为研究对象，从社会史和政治史相结合的研究视角，侧重分析政府、西方教会与民间团体等在推动近代公共卫生事业建设中其相互之间的内在关联性，进而展现近代中国政治与社会观念的演变脉络。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历史系硕士研究生李欣的《民国时期天主教地方教会的突发危机应对机制——以 1931 年厦门教区马守仁主教绑架案件为析》一文，通过民国 20 年（1931 年）4 月，在福建厦门天主教教区内发生的一起外籍主教遭匪绑架案件，探讨民国时期地方教会面对突发性危机事件情况下的应急处理过程，详细梳理了这一时期的地方社会生态。

专题三为“身份、结构与权势”，共收录 5 篇论文。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石忠祥的《国家权力渗透对边疆地区族群关系的影响——以彝族阿细人土地所有权为中心的考察》一文，在国家权力渗透的视野下，以云南彝族阿细人为例，考察土地所有权变迁对族群关系

的影响。首尔大学东洋史系博士研究生姜博的《“辛未洋扰”与清政府对朝鲜涉外事务的处理》一文，以清政府为中心，通过考察“辛未洋扰”前后中、美、朝三方的交涉过程，分析清政府被迫卷入美朝事务的原因、处理朝鲜涉外事务的体制以及对朝政策的实施效果，关注在此过程中清政府相关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是如何体现其利益诉求的，进而对晚清中国传统外交体制的瓦解进行微观展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刘洁的《国民革命时期国民党中央青年部研究》一文，主要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所藏的《五部档》和《汉口档》等档案资料，试图还原国民党青年部从成立、发展到最终撤销的组织沿革及来龙去脉，为加强国民革命时期国民党的青运史研究做出了学术贡献。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徐鹏的《三青团杭县分团的派系斗争》一文，以民国时期浙江杭县三青团组织为个案，在还原杭县三青团发展脉络的基础上，进而分析其组织变化与派系斗争。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李玉蓉的《山东抗日民主政权的实践与经验》一文，通过对山东抗日民主政权进行梳理，总结其阶段性发展特点，揭示了山东民主政权发展过程中的党政军民的互动关系，以及山东民主政权建设的历史经验。

专题四为“话语、知识与观念”，共收录 5 篇论文。中共泰兴市委党校曹晋丽（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的《毛派话语权的建立》一文，运用福柯的“话语即权力”的理论展现了毛派是如何一步步通过获得话语权来获得中共党内的最高权力的。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硕士研究生李都的《从“革命”到“文学”——1928 年“革命文学”论战中的理论争端》一文，则重点探讨了 1928 年“革命文学”论战中的理论争端，对左翼文人在“革命文学”论战的平台上进行的反思和集体对话进行了探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硕士研究生武嘉玥的《失眠的学者——顾颉刚与建国初期的知识分子政策（1949—1954）》一文，选择将顾颉刚在建国初的经历与当时的知识分子政策结合起来进行研究，进而从个体视角出发，更加透彻地探讨建国初的知识分子政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法学系博士研究生马永平的《国人日本观的演进与检讨》一文，认为归纳

整理和比较分析国人曾经的日本观,能够使对日本国民性的重新认识站在一个恰当的、有向前迈进可能的起点之上,并有助于强化对日本国家政策走向的分析和研判。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硕士研究生赵茜的《宗族衰落原因之探微——〈白鹿原〉的社会史观解读》一文,从社会史观角度入手解读《白鹿原》,从而解答关中地区宗法共同体社会解体的原因。

本书所发表的文章,经由作者会后修订,代表了作者本人的学术见解。从会议的召开到本书的出版,得到北京大学文化传承与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历史与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史进程研究中心的大力支持,谨表谢忱!

目 录

前言 1

产业、利益与发展

经济利益与地域秩序的抉择

——近代中国开矿之议及其影响 3

清末吉省蜂蜜山矿案研究 24

浅析“永久黄”集团融资 50

晚清济宁的社会结构与新经济构建

——基于与鲁西北商业中心临清的比较 75

试论 20 世纪 30 年代前期北京的旅游事业 94

一项传统手工艺的近代“遭遇”

——博山琉璃的兴衰史 107

教育、宗教与慈善

制度与观念之间

——孟禄与一战后中国的教育改革 131

绍兴县的社会教育与地方社会发展(1912—1947) 157

清至民国时期新疆维吾尔社会中阿訇司法地位的变迁 187

公共卫生视野下的近代中国麻风病救治研究

——以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广东省为中心 207

民国时期天主教地方教会的突发危机应对机制

——以 1931 年厦门教区马守仁主教绑架案件为析 215

身份、结构与权势

国家权力渗透对边疆地区族群关系的影响

——以彝族阿细人土地所有权为中心的考察 243

“辛未洋扰”与清政府对朝鲜涉外事务的处理 256

国民革命时期国民党中央青年部研究 274

三青团杭县分团的派系斗争 292

山东抗日民主政权的实践与经验 307

话语、知识与观念

毛派话语权的建立 335

从“革命”到“文学”

——1928 年“革命文学”论战中的理论争端 362

失眠的学者

——顾颉刚与建国初期的知识分子政策(1949—1954) 393

国人日本观的演进与检讨 417

宗族衰落原因之探微

——《白鹿原》的社会史观解读 434

产业、利益与发展

经济利益与地域秩序的抉择

——近代中国开矿之议及其影响

金 庆^①(首尔大学亚洲史系)

摘 要:18 世纪 60 年代的经济体系下,西方人在中国所面临的最大挑战莫过于工业原材料及轮船燃料的就地取材问题。清朝方面,随着江南制造局等接连出帆,优质煤炭之需求与日俱增,开矿就此成为朝廷之关心话题。中国采煤,历史悠久,如清代,用煤在京津社会已得到普及,故开矿对于地域秩序的影响,不言而喻。1866 年 10 月 23 日,依照同治帝谕旨,总理衙门密函沿海沿江各地区的将军督抚等详细奏报自己所见,在 1870 年前后中国史上首次出现了开矿之议。本文从经济利益与地域秩序、中国与外国、军政界与名流界、清朝满汉官员与驻清外国官员及清朝外籍官员等多个视角论析了开矿之议,并希望通过于此,衔接关于煤矿的既有研究之中的前近代与近代之间的断层。

关键词:地域秩序 开矿 贸易 近代煤矿 直隶

随着现代化的发展,石油成为当下最要之能源,如今的世界政治、军事及经济之流向亦与此有着紧密联系,其争夺可谓愈演愈烈。近代社会的流

^① [作者简介]金庆:首尔大学亚洲史系 2014 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近代亚洲贸易经济史,主要研究以朝鲜海关为中心的 19—20 世纪中韩日三国之海关贸易。

向同样与能源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然当时的主角却是煤炭。中国除上海以外的各省级区域皆蕴藏有煤矿资源,其中既能以近代技术开采,又兼具经济价值的煤田则主要分布在直隶、湖北、山东、广西及台湾等地。

18 世纪 60 年代的经济体系下,西方人在中国所面临的最大挑战莫过于工业原材料及轮船燃料的就地取材问题。清朝方面,在曾国藩等人的主导下,江南制造局等接连出帆,优质煤炭的需求与日俱增,开矿就此成为朝廷之关心话题。在此大背景下,1870 年前后中国近代史上首次出现了开矿之议。^①

随着 1868 年修约事宜的临近,中外政府高层渐渐开始关心起开矿事宜,其中湖北的大军山、台湾的鸡笼,以及直隶的斋堂、潞河和津北等地最受瞩目。^② 这些地区无一不是“富矿区”,但由于直隶环绕北京,其对地域秩序所能造成的影响很难估量,且天津又是清朝国防的重中之重,故直隶的开矿事宜成为了当时最热的话题之一。^③

① 近代的“开矿”一词与当代的用法有所不同,在近代社会“挖煤(挖煤)”与“开矿”以同格分开使用,这在左宗棠关于修约的议覆中显而易见。近代的“挖煤”,即个人或小团体以传统方式开采煤炭的经济活动,系手工业;近代的“开矿”,即承包煤田,利用蒸汽机抽水、钻井的经济活动,系重工业。开矿与挖煤的最大区别莫过于开采方式及其所生产的煤炭质地,工业用煤与轮船用煤必须达到一定的品质,然而“挖煤”所生产的煤炭中,除斋堂煤等特级煤以外,所有表层煤的品质皆无法达到其指标。

② 本文所言之津北煤田,系笔者自行命名,即指位于北京东北部、天津北部、唐山一带的煤田。从现存关于方位的资料来看,笔者判断其应为后来开平煤矿的一部分,但在当时还未被系统地开发,故没有统一的名称。

③ 表 i 近代中国煤矿(1875—1895 年)

年份	煤矿名	运营方式	年份	煤矿名	运营方式	年份	煤矿名	运营方式
1875	直隶磁州煤矿	官营	1879	湖北荆门煤矿	官督商办	1883	安徽贵池煤矿	官督商办
1875	湖北广济兴国煤矿	官营	1879	山东峰县煤矿	官督商办	1884	北京西山煤矿	官督商办
1876	台湾基隆煤矿	官营	1880	广西富川煤矿	官督商办	1887	山东淄川煤矿	官营
1877	安徽池州煤矿	官督商办	1882	直隶临城煤矿	官督商办	1891	湖北大冶煤矿	官营
1877	直隶开平煤矿	官督商办	1882	江苏徐州煤矿	官督商办	1891	湖北马鞍山煤矿	官营

资料来源:张国辉:《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 年,第 185—187 页。

马可·波罗对元大都民间用煤一事大书特书,然而华北用煤早就有之,到了清代,用煤在京津社会已得到普及,根据京津人口粗算,其消费规模相当可观。^① 津海关建立以前,京津地区的空煤活动主要以家族或家庭为单位进行,采集的煤炭亦主要用于取暖炊事。从 1875 年开始,清朝全面推动煤矿事业的发展,此后的 15 年间,朝廷以官营或官督商办的形式陆续开设或许可经营了 13 家煤矿,其中近三分之一位于直隶及北京一带,直隶从此成为近代中国最大的煤炭产区。

据实地考察过直隶煤田的西方学者称,各处之“山丘咸有煤矿破土而出”,^②尽管这有些过于夸张,但其丰富程度,在当时已然成为共识,且在全国范围内,其品质几无敌手,甚至在全球范围内与诸国顶级煤炭相比,斋堂煤亦丝毫不落下风。^③ 直隶煤炭之所以能有如此高的国际声誉,主要还是在于其优良的品质,然而这些指数仅仅是西方学者通过实地考

① 19 世纪 60 年代初,顺天府的城市人口约为 100 万(韩光辉:《北京历史人口地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年,第 120 页),天津府亦有 30 万(李竞能主编:《天津人口史》,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0 年,第 81 页),而直隶全省则有 2 700 多万(“Report of the Trade at the Port of Tientsin. For the Year 1866”,吴弘明编译:《津海关贸易报告:1865—1946》,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 年,第 51 页)。

② “Report, 1868”,《津海关贸易报告》,第 51 页。

③ 表 ii 19 世纪 60 年代直隶煤炭与国际优质煤炭参数

参数	单位	国际优质煤炭	直隶煤炭				
Newcastle-under-Lyme	Sydney Wallsend	U. S. Anthracite	斋堂烟煤	斋堂无烟煤	潞河烟煤		
Coal gas	ft2	10 000			9 856	2 324	7 928
Coke	fl	1 400			1 960	2 100	1 512
Coal tar	fl	100					175
Coke quality		Low		Anthracite	Low	Anthracite	Medium
Moisture	fl	100			26	26	350
TRD		1. 250	. 276		1. 469	1. 600	1. 450
Volatile matter	%	30. 00	36. 66	5. 00	14. 35	6. 30	23. 00

资料来源:根据 1865—1869 年“Report of the Trade at the Port of Tientsin”编制。

察所得出的一连串数字。由于受当时的生产方式所限，所产之煤的品质远没有达到理论期望值，所售单价更是与声誉有天壤之别。优越的开发条件与落后的开采方式之间的悬殊落差导致开矿事宜的问题化，而以此为基调又衍生出经济效益、地域秩序以及国防安全等一系列问题，开矿之议亦由此进入白热化阶段。

以上仅仅是对最要之直隶一案的叙述，而全国范围内大大小小的类似事件聚焦后，由起初的一个个独立事件，最终演变成为全国性议论。关于近代煤矿的研究，从史料整理到专题研究乃至个案分析，皆已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其中开滦煤矿的相关研究最为丰富；^①关于前近代的煤炭业，尽管受史料所限，其研究还处在基础阶段，但依然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果。^②目前关于从前近代到近代、土法采煤到近代煤矿的研究依然无法很好地衔接，即过渡期的研究依旧有不少空白，本文将对此部分试予以完善。

一、19 世纪 60 年代末中外开矿之议始末

1863 年，大英轮船公司(Peninsular and Oriental Shipping Co.)代理人苏特兰(Thomas Sutherland)、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 Co.)经理惠代尔(James Whittal)和德忌利士轮船公司(Douglas Lapraik Co.)老板拿蒲那(Douglas Lapraik)合伙创立了香港黄埔船坞公司(Hongkong

① 主要有《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840—1895》第 1 辑(孙毓棠编，科学出版社，1957 年)、《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帝国主义对中国工矿事业的侵略和垄断》第 2 辑(陈真、姚洛合、逢先知合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 年)、《开滦煤矿志(1878—1988)》(开滦矿务局史志办公室编，新华出版社，1995 年)、《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张国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 年)、《开滦百年纪事》(开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档案馆，开滦日报社印刷厂，2005 年)、《清代的矿业》(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中国政治制度史教研室合编，中华书局，1983 年)及「開漚炭砵の八十年」(堀内文二郎、啓明交易、1960 年)等。

② 主要有「건·가연간 북경의 석탄 수급 문제와 그 대책」(원정식, 『동양사학연구』32, 1990)、
「清朝前期の石炭業、乾隆期の炭鉱政策と経営」(倉田明子・魏郁欣, 『史學雜誌』100, 1991 年)等。

and Whampoa Dock Co. Ltd.)。^① 公司股东皆是在政界与军部有着极广人脉的社会名流,香港黄埔船坞公司自创立之初起就引起了清朝及外国的广泛关注。公司自创立以后,飞速发展,在南方业界确立了一席之地,且有了一定的发言权,这从仅有 25 万英镑的启动资金的小公司发展成为拥有 100 万英镑的庞大集团,以及吞并於仁船坞公司(Union Docks Co.)等事例中清晰可见。

然而好景不长,由于公司陷入财政危机,1875 年香港黄埔船坞公司不得不以 8 万英镑的价格把全部机器设备转让给了清朝。^② 乍一看,此次事件貌似是由长期的经营不善,以及与同行桑兹公司(Captain Sands Co.)和环球船坞公司(Cosmopolitan Dock Co.)间的恶性竞争而起,实际上是从 70 年代初开始整个船坞业就已进入黑暗期的结果。船坞公司的主要业务不外乎是船舶的修理及升级之务,从事直接贸易(Direct Trade)的大部分船舶在香港海关与江海关结关,^③但光顾香港黄埔船坞公司的顾客量却有减无增,因此可以说行驶在中国海域的贸易船只的锐减是其主要原因。

图表 1 19 世纪中后期中国通商口岸通关船舶规模



资料来源:根据 1865—1890 年“Report of the Trade at the Treaty Ports in China”

编制。^④

① Arnold Wright, *Twentieth Century Impressions of Hong Kong, Shanghai and Other Treaty Ports of China*, London: Lloyds Greater Britain publishing, 1908, p. 197.

② Arnold Wright, *Twentieth Century Impressions of Hong Kong, Shanghai and Other Treaty Ports of China*, p. 198.

③ 相比于从事直接贸易的船只,由于从事间接贸易(Indirect Trade)的船只主要在临海航行,故修理或升级船只的情况相对较少。

④ 海关贸易统计年报之文件名无固定格式,个别年报之文件名或所有不同。